

歷史片段和系統地理學

16-17世紀過渡時期歐洲關於中國南海的報告

奧利維拉*

一幅圖片傳遞的千言萬語

1606年，印刷業主約翰·特奧多爾(Johann Theodor)和約翰·伊斯拉埃爾·德·布萊(Johann Israel de Bry)在用德文出版的《短暫的航海》(*Petits Voyages*)第八卷裡發表了一幅表現“阿馬港”(Amacao)一景的圖片。《短暫的航海》是他們的《在東印度和西印度朝聖之旅》遊記文集(*Collectiones Peregrinationum in Indiam Oriental et Indiam Occidentalem*)中“東方之旅”系列的題目，並且由他們的父親、著名地圖學家和弗拉門戈出版家特奧多爾·德·布萊(Theodor de Bry，緬因河畔法蘭克福，25卷，1590-1634)策劃並出版。特奧多爾·德·布萊生於列日(Liège)一個基督教家庭，由於遭到阿爾巴公爵(Duque de Alba)和西班牙天主教階層的迫害而離開祖國，於1570年前後移居當時歐洲重要的出版之都法蘭克福。我們前面提到的澳門圖片——澳門地區第一幅印刷作品——還曾出現於1607年在德國同一城市用拉丁語出版的《短暫的航海》中。兩幅圖片都帶有這樣一個說明：“這是中國城市澳門。荷蘭人曾試圖以和平的方式訪問她。他們向那裡派出了使節，但是，此後這些使節卻杳無音訊。於是，

他們派出一位船長率船前往，然而，大約二十幾名船員中沒有一個(船員)回來向他們通報那裡的情況。最終，他們打消了訪問她的念頭。”

在我們看來，德·布萊兄弟出版的澳門圖片和說明所承載的新的資訊在於，它們傳遞了三個基本事實。首先，它是所謂歐洲第二次擴張初期即16世紀向17世紀過渡時期的典型見證。此時，英國人、荷蘭人和澤蘭人開始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自15世紀起在全球許多地區確立的統治發起了挑戰，例如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77-1580)和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 1586-1588)完成的環航世界之旅，開闢了從東南方前往亞洲的路線，以及1600年建立的倫敦東印度公司和同一年在英國水手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的幫助下，第一艘荷蘭船抵達日本。作為荷蘭在亞洲海上貿易實力崛起最突出的例子，1595年，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曾經率領第一支荷蘭艦隊抵達因蘇林達(Insulindia)，同樣，1601年在萬丹(Bantam)對葡萄牙人取得海上軍事勝利之後，剛剛建立不久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 或 *Companhia Holandesa das Índias Orientais*)又掌握了對巽他(Sunda)海峽的統治。再後來，1603年，中國商船第一次在新加坡海峽被赫姆斯科克(Jacob van Heemskerck)率領的船隊截獲，一千五百噸的巨

*奧利維拉(F. R. de Oliveira)，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地理學學士，(西班牙)巴賽羅納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里斯本新大學海外歷史研究中心全職研究員，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巴西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若干關於地理學歷史和理論、文化地理、古代地圖學和葡萄牙殖民城市發展的研究文章。



AMACAO.

輪聖卡塔琳娜號(*Santa Catarina*)的貨物為拍賣市場賺取了三百多萬畿尼。

《短暫的航海》上短短的配圖說明還提供了一個與上述事件如出一轍的事件：1601年9月底至10月初，海軍上將雅克布·范·內克(Jacob van Neck)率領的艦隊經過澳門。這是內克為阿姆斯特丹老公司(*Oude Compagnie*)——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前身之一——所完成的第二次東方之行。船隊共有大約七百人，剛剛進攻過駐紮在摩鹿加群島(Molucas)蒂多雷島(Tidore)上的葡萄牙軍隊。船隊從那裡駛向馬來半島東海岸的北大年(Patane)，兩艘軍艦和內克的雙桅船在中國南海附近遇到了颱風突襲，一直被帶到了澳門港。如人們所知道的，地理大發現時代早已經過去，在繞過好望角之後，荷蘭人船隊到達的地點和行駛的航線已經不再是新聞：巽他海峽、爪哇、摩鹿加、勃泥北部(Bornéu)、暹羅灣(Siāo)……不同的祇是歐洲的始發港和目的地港——泰瑟爾(Texel)、米德爾堡(Middelburg)、鹿特丹(Roterdāo)、代爾夫特(Delft)、霍倫(Hoorn)、恩克赫伊曾(Enkhuisen)和北海另一側的普利茅斯(Plymouth)或倫敦——，以及為尋求香料而派遣新的船隊的國家和駕駛船隊的人們。

其次，在讀到1606年德·布萊留下的那條簡短資訊時，我們還想到的是其內容的真實性。我們知道，在得知蒂多雷發生的事情之後，大部分澳門臨近地區的人在看到雅各布·范·內克船隊的風帆出現在海平面的時候，便跑到三巴山上的耶穌會神學院尋求庇護。事實上，荷蘭人從雙桅船上放下來一隻小船，當小船來到陸地的時候，便被當時統治這個殖民地的總督波爾圖加爾(D. Paulo de Portugal)的手下人抓獲。自此，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荷蘭方面的說法是，范·內克不知道那裡是陸地，祇是想瞭解情況；而反方的說法卻是，荷蘭人試圖在澳門重演幾個星期以前對摩鹿加發動的進攻。無論如何，第二天早上，范·內克派出了一條小船前去打探為甚麼沒有任何消息，從港口駛出的四艘帆船截獲了這隻船，

有一些船員傷亡，其餘的人均被俘擄。鑒於不可能對《短暫的航海》中提到的二十人進行救援，荷蘭海軍上將祇好放棄，任他們聽天由命。而澳門當局此時卻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人數上佔有壓倒多數，部分可能——或者也許——是因為害怕外國人的出現會給他們與廣東當局之間造成麻煩。大約有十七個荷蘭人被以海盜的罪名判絞刑並立即執行。三個得以倖免的人經馬尼拉去了果阿，從那裡於1604年返回荷蘭。

荷蘭方面關於雅各布·范·內克在澳門這段經歷的實際記錄出現在他第二次東印度之行的遊記中(1600-1603)。內克船隊旗艦上的隨船神父羅艾洛夫·羅艾洛夫茨(Roelof Roeloffsz)撰寫的文章發表於德·布萊的《短暫的航海》第八卷，並被伊薩克·科梅林(Isaac Commelin)收錄在荷蘭航海叢書《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Begin ende Voortgang, Van de Vereenighde Nederlantsch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阿姆斯特丹, 1645)中。葡萄牙關於相同事件的記述，我們現掌握有《關於耶穌會神父在東方活動的年度報告》(*Relações anuais sobre a actividade d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o Oriente*, 里斯本, 1605)第二卷中由耶穌會編年史學家費爾南·格雷羅(Fernão Guerreiro)審定的文章。這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後一次)記錄和傳遞事件真相的人們就出現在中國南海的歐洲人問題上各執一辭的情況。關於1582、1584和1598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間以澳門為中心的爭奪，文字紀錄錯綜複雜，這在某種程度上與關於1601年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之間衝突的記錄十分相似。

例如，翻閱西班牙耶穌會教士路易士·德·古斯曼(Luis de Guzmán)1601年在阿爾卡拉得埃納雷斯(Alcalá de Henares)出版的《傳教團史》(*Historia de las Misiones*)，找不到任何關於同樣是西班牙耶穌會教士的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1582年在澳門開展的大膽的同步外交活動的隻言片語。桑切斯除了號召澳門人擁護葡萄

牙和西班牙王室的聯合之外，還試圖在與菲律賓殖民地進行貿易時從廣東官員那裡得到相當於葡萄牙人已經在澳門得到的那樣的待遇。在文章中，這份傳教報告用了大量的篇幅談到桑切斯1584年的第二次澳門之行。在這裡，古斯曼又一次對這位神父從菲律賓帶來的指示避而不談，而這些指示的目的正是要保證在福建建立一個西班牙商港和尋求廣東-馬尼拉之間的直接貿易。

我們來看1598年，在這一年，一個由唐·胡安·薩穆迪奧(D. Juan Zamudio)率領的西班牙代表團與廣東當局就在澳門附近出讓一個地方的問題開展談判，當時西班牙方面的資料稱其為Pinal或Pinhal。葡萄牙在這個商棧的總督立刻作出反應，對菲律賓總督的代表使用武力，同時，澳門

的主要利益者們也立刻做出反應，要求中國人發佈驅逐令。關於這場新的衝突，再沒有比多明我會的加布里埃爾·德·聖·安東尼奧(Gabriel de San Antonio)的《柬埔寨王國大事記》(*Relación de los sucesos del Reyno de Camboxa*，巴厘阿多利德，1604)和果阿的編年史學家迪烏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的《亞洲第十二個十年》(*Década XII da Ásia*，巴黎，1645)更南轅北轍的記錄了。前者表現了對馬尼拉行政和教會當局的友善，回避了其鐵腕下最殘酷事實的記錄，而後者則援引果阿一切可用的檔案資料，呈現了可以稱之為澳門社會英雄行為的記錄。

原馬尼拉檢審法院法官安東尼奧·德·莫爾加(Antonio de Morga)在遠離他曾經供職的這個亞洲



殖民地以後，也曾在1609年在墨西哥出版的《菲律賓群島紀事》(*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中記述過1598年所發生的種種事件。關於莫爾加博士，圍繞着他的是一個行為謹慎的光環，這是與馬尼拉同時代的大部分人的行為方式截然不同的美德。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摘引了許多西班牙文件來證明唐·胡安·薩穆迪奧用幾千比索收買中國人，並記錄了針對西班牙在澳門獲得一個港口並在廣東建立一個商棧的企圖，葡萄牙人採取的不友善行為是如何發生的諸多細節。毫無疑問，我們今天無限感謝這位高尚的作者所做記錄的罕見品質。但是，一個17世紀之初的讀者在面對關於曇花一現般的 Pinhal 的三種說法的時候，便會質疑事件的真實性：事情真是這樣嗎？



回到德·布萊兄弟出版的澳門圖片，我們來看它帶給我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問題。1867年，萊頓大學(*Universidade de Leiden*)圖書館館員皮埃爾·安托尼·蒂勒(*Pierre Antoine Tiele*)在阿姆斯特丹編輯了一份題為“荷蘭航海家日誌之書目提要”(*Mémoire Bibliographique sur les Journaux des Navigateurs Néerlandais*)的關於歐洲第二次擴張的歷史文獻參考資料。在這份資料中，蒂勒認為，和《短暫的航海》第八卷裡的其它圖片一樣，“阿馬港”的圖片應當僅僅是編輯者們想像的圖畫。

事實上，1606年發表的圖片令一些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有諸多原因。首先，這是一幅鳥瞰圖，畫面偏西90度角，展現了內港的景象，左下角是水道。圖片中想像的內容出現在半島的東南端的延伸部分，似乎是為了使整個畫面達到平衡效果。其次，畫面中的建築物比我們所瞭解的當時存在的建築物要少得多。第三點與實際不符的是，許多建築物過於龐大，帶有典型的北歐城市的建築風格。這些還不夠，繪畫者還在南灣北面杜撰了一個奇異風格的結構，可能是想畫一座中國寺廟。除此之外，在街景中出現的一些人物形象中，男士的形象突出，他們具有歐洲人的外表，身着歐式服裝，有奴隸或僕人為他們撐着陽傘。它不過是明顯再現了當時反映印度的葡萄牙人生活的許多荷蘭畫作的模式。

儘管有這些杜撰的細節，對這一時期圖片的深入研究使我們在今天可以這樣認為，1606年法蘭克福印製的這幅澳門圖片的情景是根據一個葡萄牙版本而製作的，與佩德羅·巴雷托·德·雷森德(*Pedro Barreto de Resende*)在為《東印度國各要塞城市和居民點圖冊》(*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oen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一書繪製同名地圖時所依據的同屬一個版本。這本書是印度編年史學家

◁ 荷蘭第一次東印度遠征 (引自：*Journael van de reyse der Hollandsche scheppen*，米德爾堡·1598)

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於1635年應葡萄牙菲力普三世國王的要求而編纂的。葡萄牙出版的地圖自16世紀末開始在低地國家大量流行，這使我們能夠推斷出讓德·布萊兄弟大大先於博卡羅的著作而得到這個版本的種種可能的情況。《短暫的航海》的插圖明顯比後來署名為雷森德的圖片要簡單，它增加了我們已經列舉的那些想像的細節，以及對地貌的很多失真的描述。

想像再次覆蓋了真實的場景。出版者們對這個版本堅信不移，德·布萊兄弟的澳門插圖成為17世紀荷蘭、德國和英國絕大部分畫作的樣板。不論是懷有特殊利益和預謀的出版者們，還是帶有個人喜好的讀者們，在作為真實性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圖像面前都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很久以後，當愛德華·卡文迪什·德雷克（Edward Cavendish Drake）的《真實愉快的航海和旅行新全集》（*New Universal Collection of Authentic and Entertaining Voyages and Travels*，倫敦，1770）一書的出版者將一幅日本人結婚的圖片夾在了埃爾曼·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的征服墨西哥的報告中的時候，有人對此提出抗議嗎？拋開現實性和出版工作的嚴謹性不談，澳門圖片的出版有助於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對這個城市各方面生活的興趣，並且也符合未來的一個基本趨向：廣義地理學領域內的空間學科具有了可感知性。

勸導大師

我們剛剛談到了，正像地理大發現和現代歐洲擴張史的各個篇章那樣，16世紀向17世紀過渡期發生在中國南海的歐洲人之間的相遇和對抗的情況，同樣出現在不同管道的文字記錄中。像德帕里斯（Senhor de La Palice）先生所預言的那樣，人類的歷史永遠都不是祇有黑白兩色。海外不同經歷的記錄同樣總是以不同來源的文字為這個被稱之為“遊記文學”的文學流派作出貢獻：書信、報告、日記、道路手冊、協議、編年史等

等。然而，航海活動在這類文集所涵蓋的時期和地理區域裡的快速發展和多樣性提醒我們，要對各種記錄或那些帶有這樣兩個基本特點的文獻的來源給予特別的注意，一方面，它們的傳播是由於當時的國家集團的報導以及自身政治戰略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它們保留了報告的隨意性和相關人物的人文精神。在這些資料中，我們主要關注那些既沒有對知識性的過分追求，也沒有為了青史留名而賦予文字過多主觀臆想的自主撰寫的文章和大型的遊記叢書。越來越多的不同層次的公眾讀者認同那樣的較為輕鬆的文字，從中獲得一系列具有實用性的知識：政治和外交形勢、貿易前景、正在進行的傳教工作、航海指南或地理趣聞。

在文學範疇裡，歐洲地理大發現時期結束的象徵是西蒙·革呂紐（Simon Grynaeus）作序、約翰·許蒂士（Johann Hüttich）撰文的《新世界和未知的海外島嶼》（*Novus Orbis Regionum ac Insularum ueteribus incognitarum*）文集的出版（巴西萊亞 [Basileia]，1532）。在出版了兩套文集即蒙塔博多（Fracanzio da Montalboddo）的《重新發現的國度》（*Paesi novamente ritrovati*，維琴察，1507）和帕芒蒂埃（Jean Parmentier）的《世界奇跡新編》（*Description Nouvelle des Merveilles de ce Monde*，巴黎，1531）之後，《重新發現的國度》被直接收入——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除了被翻譯為多種文字並再版之外——威尼斯文學家佐志（Alessandro Zorzi）1538年以前組織出版的五卷手抄文摘，以及安東尼奧（Antonio）和保羅·馬努吉奧（Paolo Manuzio）的題為“從威尼斯到波斯塔納和君士坦丁堡之行”（*Viaggi fatti da Vinetia, alla Tana, in Persia, et in Constantinopoli*，威尼斯，1543）的著作中。1550年，賴麥錫（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出版了他極富盛名的三卷航海文集《航海旅行》（*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威尼斯，1550-1559）的第一卷。賴麥錫編纂這部書的目的是向廣大好奇的公眾——不祇是那些懂得藝術書籍的拉丁文的人文學者或者達官顯貴

們——介紹航海事業的發展和那些新的發現者所到之處的歷史、地理和地圖的基本情況。修正托勒密(Ptolomeu)地理學的錯誤是編撰者開誠佈公的意圖。但同時，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的是，自那個世紀初期起，整個威尼斯對航海事業和其他歐洲人在非洲、美洲，特別是在亞洲的征服事業，都莫衷一是，而賴麥錫則適時地成了表達他們焦慮不安的代言人。

當歷史學家、出版家和地理學家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整理、分類和遴選資料並編纂為一本題為“1589年英格蘭民族重要的航海、旅行和發現”(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的書的時候，現實的壓力重新以獨特的方式出現了。西班牙艦隊剛剛在英吉利海峽被打敗，北美洲已經被英國人視為一片新的希望之鄉。正是對大西洋另一邊土地的朦朧的興趣催生了英國第一部旅行文集理查·伊登(Richard Eden)的《新世界或西印度的時代》(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es, 倫敦, 1555)的出現。正當英國貴族和商業當局把尋找從西北到中國去的通道作為當務之急、弗羅比歇(Martin Frobisher)準備為此進行嘗試的時候，理查·威利斯(Richard Willes)的《東西印度旅行史》(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倫敦, 1577)為他提供了支持。

另一位哈克盧特同一血脈的“勸導”大師是弗拉門哥人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英國人和荷蘭人後來建立的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他收集在《葡屬東印度航海旅行記》(Itinerario, Voyage ofte Schipvaert naer Oost ofte Portugaels Indien, 阿姆斯特丹, 1596)中通過遊記、航海圖志和地圖發出的感召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當人們正積極地組建一個機構招募法國傳教士赴東亞、為越南東京(Tonquim)、交趾支那(Cochinchina)和南京(Nanquim)任命使徒主教，因為這些對於確立法國在東方的外交雄心和政策具有決定性意義，法國耶穌會教士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

的題為“在中國和其他東方王國各種傳教之旅”(Divers voyages et mission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 巴黎, 1653)一書在這個時候的出版並非偶然。佩羅·德·馬加良斯·德甘達沃(Pêro de Magalhães de Gândavo)的《巴西土地協議》(Tractado da Terra do Brasil, 手稿, 1569, 一部類似紀實性報導的作品)也被認為是一部同屬於具有勸導目的的作品，他的書對此有極其明確的表述：“總而言之，記述了巴西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並使其美名聞達於這些王國裡生活在貧困中的許多人，並使他們相信選擇那片土地是他們的出路。”

在此以後出版的湯瑪斯·福克納(Thomas Falkner)的《南美洲巴達哥尼亞和相鄰地區》(A description of Patagonia and the adjoining parts of South America, 赫裡福德, 1774)——在這部著作中，這位醫生、航海家和耶穌會教士提醒英國人注意巴達哥尼亞土地的被遺棄——與西班牙卡洛斯三世決定在美洲大陸的最南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實體即普拉塔河總督轄區(Rio da Prata, 1776)有着密切的關係。最終我們知道，是亞歷山大·麥肯齊(Alexander Mackenzie)在1792年10月和1793年7月之間為英國人完成了關於橫跨北美的報告，呼籲英國控制哥倫比亞河和太平洋的西北部，並建立一個跨越加拿大的貿易帝國。這篇報告最初是以“從蒙特利爾到冰封海岸和太平洋的旅行”(Journal from Montreal to the Frozen and Pacific Oceans)的題目發表的，後來則以“1789和1793年在聖勞倫斯河上和穿越北美洲到冰封海岸和太平洋的航行”(Voyages on the River St. Lawrence and through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 to the Frozen and Pacific Oceans in the years 1789 and 1793, 倫敦, 1801)的題目出版。我們知道，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在責成瑪利威瑟·路易士(Meriwether Lewis)船長和克拉克(William Clark)中尉沿哥倫比亞河和密蘇里河去尋找“為了貿易目的而穿越大陸的最便捷水陸交通線”之前讀到了這篇報告。我



東南亞地圖 作者：威廉·布勞（Willem Blaeu） 1635

們還知道，路易士在其1804-1806期間進行的史詩般的旅行中隨身攜帶着麥肯齊這部著作的複製本，而他的旅行正是美國向西部擴張的開始。時間變化了，作為回報，這部遊記的教益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地理學，歷史的太陽

我們已經看到，現實的需要對一個遊記叢書和地理航海為特點的資訊的出現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正像布萊和他的兒子們所做的那樣。《短暫的航海》中許多圖片和地圖的豪華阻礙了它們在更為廣大的公眾中的傳播。無論如何，這項出版

工程的實用價值很快就在後來更容易接觸到的出版物中體現出來。

林旭登的名為“二十六次東西印度之行”（*Sammlung von 26 Schiffahrten nach Ost und West-Indien*）的旅行記——Levinus Hulsius於1598年編輯出版的英國人和荷蘭人的二十六次航行的文集——或米奇爾·科萊恩（Michiel Colijn）印製的馬頓·霍伊貝丁克（Marten Heubeldinck）的《東西印度旅行記》（*Oost-Indische ende West-Indische voyagien*，阿姆斯特丹，1619）都屬於這種情況。後來，依薩克·科梅林發現並收入他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Begin ende Voortgang*）中的檔被用於阿姆斯特

丹出版的兩部觀點相左的文集，即約斯特·哈特根斯(Joost Hartgers)的《東印度之旅》(*Oost-Indisch Voyagien*, 1648)和希利斯·約斯登·薩赫曼(Gillis Joosten Saeghman)的《東印度遊記》(*Verscheide Oost-Indische Voyagien*, 1663-1670)。直接做倣賴麥錫、哈克盧特和科默蘭的做法，17世紀荷蘭的出版者們使這類文集具有了真正的國家特色。在人們擔心這種編纂資料的做法被逐漸用於其它文章的同時，它已經被當作宣傳海上貿易和海外領土殖民化的理想文學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大型遊記文集集中表現了的對海外事業的鼓勵主要依靠的是這些出版物的史實價值，也就是說，選取的各種記述、遵循的路線或航行中的意外事件帶來的影響。然而，所有這些經歷都不能脫離其前後相關的編年時代，因此，它們同時也成為一整套具有嚴格地理學特點的紀錄，例如各地的形勢和特點、植物、動物、土地的使用、地貌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或者其行政、政治和司法制度。在大型文集《英國航海、旅行和地理發現全書》(*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倫敦, 1598)第一卷的前言中，哈克盧特將地理學和編年史的貢獻歸納為“整個史學的太陽和月亮、右眼和左眼”。英國出版家的這番話對於具有遠遠高於純粹的附屬“學科”地位的廣博的地理學來說顯然有欠公允，但卻道出了問題的本質：正是這種以另一種眼光看待世界的做法為其政治-文學計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且不說這些文集向我們展示的人間悲劇的色彩與陰影——探險之旅、航行、遇難、戰爭和救援——，我們發現，它們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這些記錄面對各種事件表現出的寫作自主性。事實上，哈克盧特的這段話要強調的也許與他的想法從來就不是矛盾的，即將其選中的每一個旅行所到之處的地理作為次要內容予以保留。歸根到底，在對國家、城市或者居民的描述中順帶提及的內容是歷史和紀實作品自身特點中的另一個側面。無論如何，擁有一個關於眾多遠方地區地理和人口特點的龐大資料庫這個簡單的事實，足以

使這些資料組成的系列在旅行文集中引起不同尋常的關注。

負責通過媒體推介新航海線路和新殖民地地區的人很快注意到這些充滿奇聞的出版物的實用性，以及由於原作者所傳播的知識和新的海外經驗之間不斷衝撞產生的各種批判性的反思。儘管這種做法不無風險(許多事實證明，盲目相信書本經典會忽視海員或商人傳遞的經驗)，卻是現代地理學的主要依據之一。我們在雅各·范·內克第二次東印度旅行的日記中的幾處摘抄(inwerp)中找到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事例。我們看到，這份檔於1606年用德語第一次在德·布萊兄弟的《短暫的航海》第八卷編輯出版。根據依薩克·科默蘭的文集提供的版本——我們看到，在那裡這部日記被重新編輯——，我們發現五處從其它作品中提取的獨特的摘抄。

第一段摘抄是關於旅行者認出特爾納特島(Ternate)的描寫，它記錄了西里伯斯(Celebes)和哈馬黑拉(Halmahera)群島的地理面貌、物產資源和島上居民的生活習俗。這部自主著作首先用非常簡短的篇幅描述了托勒密和墨卡托(Mercator)設計的地區地圖，最後提到了收入同一部文集的雅各·范·內克和懷伯蘭特·范·瓦立克(Wybrant van Warwijck)第一次東印度旅行報告對安汶群島(Amboino)的描述(在這裡，托勒密和古代宇宙學家們的描述中同樣穿插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當代航海的資料)。

第二段摘抄的內容是關於北大年(Patane)的。在這裡，從土地的肥沃到中國的對外貿易、從暹羅的政治監管權到首都的城市地理、從當地居民的語言和性格到氣候都有記錄。出版者明確承認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來自戈特哈德·阿爾圖斯(Gotthardt Artus)的報告，這份報告還被第三次在關於暹羅的出版物中轉載。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維克多·斯賓克爾(Victor Sprinckel)、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和林旭登的著作。在許多主題中，有一些涉及礦產、森林、收成和王權、城牆、教育、宗教、政府、毗鄰的王

國和飲食習俗。第四段摘抄專門談到了馬尼拉：土地面積、關於它開埠的記錄、氣候和當地居民的社團、馬來人的一些體貌和文化特徵、葡萄牙人對有關港口的征服及其戰略意義。這篇遊記的結束和它的開始一樣毫不拖泥帶水。日記的連慣性恰到好處地連接起那些中斷的內容，隨後是大段的描述：“1602年8月23日早上，船隊起錨，沿着東南和西北海岸邊的航線、借助有利的風向前往北大年……”

從一般的觀點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的出版者決定在雅克布·范·內克的第二次東方之旅的遊記中添加的第五段即最後一段摘抄是所有摘抄中最重要的。它是關於“從海路到達契丹（Cataio）的五種不同方法，兩種是人們所瞭解的，另外三種僅僅是推測”。這段摘抄來自威廉·博梅的《海上軍團》（*A Regiment for the Sea; Conteyning most profitable Rules, Mathematical experiences, and perfect knowledge of Navigation, for all Coastes and Countreys, most needful and necessary for all seafaryng Men and Travellers, as Pilots, Marines, Merchants, etc., exactly derived and made by William Bourne*，倫敦，1573）中的“從海路到達契丹的五種不同方法”（“Hydrographical Discourse of the Five Ways to Cathay”）的翻譯。它提到，貝爾納的著作是馬丁·科爾特斯（Martín Cortés）的《地球和航海術簡明教程》（*Breve compendio de la Sphera y de la Arte de navegar*，塞維利亞，1551）的擴大版本，這是一本關於宇宙和近海航行和航海實用問題的手冊，其內容有助於將西班牙航海地圖實用“手冊”（或者教科書）的水準提高成為真正系統的航海術著作。這部著作被理查·伊登翻譯為《航海術》（*The Art of Navigation*，倫敦，1561），同時對荷蘭人蜜雪兒·科內特（Michel Coignet）的著作《航海術最實用新教程》（*Instruction nouvelle des points plus excellents necessaires, touchant l'art de naviguer*）（安特衛普，1581）具有啟發作用。它還提到，《海上軍團》一書出版於16世紀70年

代下半葉，當時，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英國正在以特別的方式努力尋找通往中國的最直接的路線，在此後不久，吉伯特（Humphrey Gilbert）出版了他的《尋找契丹新航線》（*Discours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 1576），馬丁·弗羅比歇（Martin Frobisher）出發試圖通過巴芬灣（Baía de Baffin）到達中國（1576-1578）。

在1645年依薩克·科梅林提供的這第五段摘抄中，從一開始，一個多次出現的明顯屬於過去時代的地名引起人們注意：馬可·波羅和中世紀其他旅行家所使用的 Cataio（契丹），而不是歐洲現代航海家們所使用的 China（中國）。這再次讓我們看到古代作家文章的長久的影響力，不管其是否屬於無意之舉，還是由於人們認為要使關於疆界的新知識可信而必須抄襲他們的摹本而為之。然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范·內克的航海遊記的出版者尤其看好的是當時地理學所包涵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與文學寫作的結合。如果這樣做能極好地反映出各地地理和人文所專有的特點，作為綜合性數學的地理學的實踐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全球的地圖測量和繪製。

在這個明顯帶有捍衛基督教-要求權利的意圖和很強實用性的出版項目中，雅克布·范·內克的第二次東印度之行的著作由於其稀有而成為關於前往中國的航海術發展的資料。另一方面，它宣傳了低地國家的海上成就，滿足了公眾對其民族到達或希望到達的主要地區的地理知識的好奇心理。同時，提供了被認為有助於國家向海外那些最嚮往的目的地開展新航行的實用知識。China 仍然能夠奇怪地與 Cataio 相混淆，而博梅的文章肯定也沒有前往中國的最可推薦的航海路線或者足以抵達那裡的指導。但是，當歷史加速的時候，沒有過多的時間去考量對錯與否。在這種情況下，盡快將一切可用資料付梓出版被認為是一種美德。

然而，歸根結底，前往中國的路線祇有那五條嗎？如人們所希望的，兩條已為人知的是“葡萄牙人經卡利卡特（Calecute）和摩鹿加群島的路線”，以及“經麥哲倫海峽（estreito de Magalhães）和

南海的路線”，即好望角航線和跨太平洋航線。尚不為人知的路線即以挑戰聞名的並且讓許多遠征隊付出生命代價的三條線路：英國從西北和東北到達中國的路線，以及由商人羅伯特·斯魯納(Robert Throne)在1527建議的直接穿越北極的路線！這部加入了摘抄的著作的作者是誠實的，他承認沒有用指南針測量過所有這些線路、氣候和各站的情況，對提供的經度、緯度的計算和在有關路途中出現的地名也沒有把握。誠如他所認為的，這些並不重要：“如果是我偶然搞錯了，那麼就讓我提供的線索至少能夠激勵航海者們，迫使他們去尋找改正我所犯錯誤的方式，並使這項工作更加完善，使公眾從中受益。”

【文獻書目】

- 阿舍 (Asher, A.)，〈萊維努斯·赫爾修斯和他的繼承者們在1598至1600年間於紐倫堡和法蘭克福出版的航海和旅行文集簡明文獻書目〉(Bibliographical Essay on the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Levinus Hulsius and his Successors at Nuremberg and Francfort from Anno 1598 to 1600)。阿姆斯特丹：Meridian Publishing, 1962。
- 巴爾馬塞特，拉烏爾·雷伊斯(Balmaceda, Raul C. Rey)，〈阿根廷的領土完整〉(Integración Territorial de la Argentina)。布宜諾斯艾利斯：SENOC — 非常規教育制度促進會(Asociación para la Promoción de Sistemas Educativos No Convencionales), 1985。
- 比爾，德(Beer, E. S. de)，〈十八世紀的遊記文學(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見《1975年年度和賬目報告》(Annual Report an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1975)。倫敦：The Hakluyt Society, 1975，第1-6頁。
- 博克瑟，查理斯 (Boxer, Charles R.)，〈阿馬港的大船〉(O Grande Navio de Amacau)，曼努埃爾·雷奧爾·維拉利諾 (Manuel Leal Vilarinho)。澳門：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研究中心，1989。
- 博克瑟，查理斯，〈1550-1770貴族在遠東〉(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 1550-1770)、〈古代澳門紀事和傳說〉(Factos e Lendas de Macau Antigo)，特雷莎和曼努埃爾·巴朗·奧雷伊羅 (Teresa e Manuel Baimão Oleiro) 翻譯。澳門：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研究中心，1990。
- 博克瑟，查理斯，〈依薩克·科默蘭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同前，〈Opera Minora〉，第二卷，〈東方學〉(Orientalismo)，迪奧戈·拉馬達·庫爾托(Diogo Ramada Curto)。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2，第127-147頁。

- 布羅克，努馬(Broc, Numa)，〈1420-1620文藝復興時期的地理學〉(La géographie de la Renaissance, 1420-1620)。巴黎：教育部，歷史科學工程委員會出版社(Éditions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86。
- 布萊，特奧多爾·德(Theodor de Bry)，〈美洲1590-1634〉(América, 1590-1634)，Gereon Sievernich出版；約翰·H·伊里亞德(John H. Elliott)做序；阿丹·卡瓦科西斯(Adán Kovacsics)翻譯。馬德里：Siruela, 1995。
- 卡佩爾，霍拉西奧(Capel, Horacio)，〈航海時代的地理學和航海術(Geografía y arte apodémica en el siglo de los viajes)〉，〈地學評論——人文地理評論集〉(Geo Crítica – Cuadernos Críticos de Geografía Humana)。巴賽羅納：巴賽羅納大學出版，56，1985年3月。
- 卡佩爾，霍拉西奧，〈科學學科學和歷史——一個地理學研究專案的目的和分支(Historia de la Ciencia e Historia de las Disciplinas Científicas – Objetivos y bifurcaciones de un programa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historia de la geografía)〉，〈地學評論——人文地理評論集〉。巴賽羅納：巴賽羅納大學出版，84，1989年12月。
- 庫爾托，迪奧戈·拉馬達，〈十五世紀末歐洲對世界的觀察：延續、斷裂和抗拒(A visão europeia do mundo em finais do século XV: continuidades, rupturas e resistências)〉，見若阿金·奧利維拉·卡埃塔諾(Joaquim Oliveira Caetano，協調)，〈世界圖片和知識：國家圖書館文集集中的插圖版書籍〉(Gravura e Conhecimento do Mundo: O Livro Impresso Ilustrado nas Coleções da BN)。里斯本：里斯本國家圖書館，1998，第23-42頁。
- 庫爾托，迪奧戈·拉馬達，〈文學與實踐的共性(Cultura escrita e práticas de identidade)〉，見Francisco Bethencourt & Kirti Chaudhuri (出版)，〈葡萄牙擴張史〉(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里斯本：讀者協會(Círculo de Leitores)，第一卷，1998，第458-531頁。
- 庫爾托，迪奧戈·拉馬達，〈序言——東方學和編年史學者(Introdução – Orientalistas e cronistas)〉，見查理斯·R·博克瑟，〈Opera Minora〉，第二卷，〈東方學〉，迪奧戈·拉馬達·庫爾托出版。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2，第XIII-LX頁。
- 庫爾韋洛，亞力山大(Curvelo, Alexandra)，〈圖片和知識：關於(16-18世紀)歐洲人未知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環境在圖片裡的傳播(Gravura e conhecimento: sobre a difusão na gravura da representação dos povos, culturas e meios naturais desconhecidos dos Europeus (séculos XVI-XVIII))〉，見若阿金·奧利維拉·卡埃塔諾(協調)，〈世界圖片和知識：國家圖書館文集集中的插圖版書籍〉。里斯本：里斯本國家圖書館，1998，第53-65頁。
- 丹維勒，法蘭西斯·德(Dainville, François de)，〈人文學者的地理學——法國社會的教士和教育〉(La Géographie des Humanistes – Les jésuites et l'éduca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巴黎：Beauchesne et ses Fils, 1940。
- 大衛森，朱利安和萊·基·丹 (Davison, Julian & Lay Kee, Tan)，〈繪製亞洲大陸地圖〉(Mapping the Continent of Asia)。新加坡：古代東方(Antiques of the Orient), 1994。

- 甘達沃·佩羅·德·馬加良斯·德(Gândavo, Pêro de Magalhães de), 《巴西土地協議》、《桑塔克魯斯省歷史》(*História da Província de Santa Cruz*), 卡比斯塔諾·德·阿布來烏(Capistrano de Abreu)出版。貝洛奧裡藏特: Itatiaia出版社, 1980。
- 希爾, 胡安(Gil, Juan), 《大發現傳奇和烏托邦》(*Mitos y 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 第二卷, 2, 《太平洋》(*El Pacífico*)。馬德里: 出版聯盟(Alianza Editorial), 1989。
- 吉拉多, 瑪麗亞·塞西莉亞(Guirado, Maria Cecília), “通過佩羅·德·馬加良斯·德·甘達沃著作傳播的首批巴西的異國圖片(A divulgação das primeiras imagens exóticas do Brasil através dos escritos de Pero de Magalhães de Gândavo)”, 見《海外歷史編年史》(*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里斯本: 海外歷史中心(Centro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 里斯本新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 4, 2003, 第133-140頁。
- 路易斯, 梅里韋瑟(Lewis, Meriwether), 《路易斯和克拉克的日誌》(*The journals of Lewis and Clark*), Bernard De Voto 出版; 斯蒂芬·E·安布魯瓦茲(Stephen E. Ambrose)作序; 埃文·賴茲(Erwin Raisz)配地圖。波士頓/紐約: Mariner Books, 1997。
- 洛佩斯·皮涅羅, 何塞·瑪麗婭(López Piñero, José María), 《復興時期的西班牙航海術》(*El arte de navegar en la España del Renacimiento*)。巴塞羅納: Editorial Labor, 1986。
- 梅斯基特拉, 貢薩洛(Mesquitela, Gonçalo), 《澳門歷史》(*História de Macau*), 第一卷, 第二冊。澳門: 澳門文化公司, 1997。
- 蒙特羅, 阿爾曼多·達·席爾瓦·薩圖米諾(Monteiro, Armando da Silva Saturnino), 《葡萄牙海軍的戰役和戰鬥》(*Batalhas e Combates da Marinha Portuguesa*), 第四卷, 1580-1603。里斯本: Livraria Sá da Costa Editora, 1993。
- 莫里諾, 蜜雪兒(Morineau, Michel), 《(16-19世紀)東印度大公司》(*As Grandes Companhias das Índias Orientais (séculos XVI-XIX)*), 杜瓦爾特·達·科斯塔·卡布拉爾(Duarte da Costa Cabral)翻譯。門·馬丁斯: 歐美出版社(Publicações Europa-América), 2004。
- 奧利維拉, 弗郎西斯科·羅格·德(Oliveira, Francisco Roque de), “1500-1630歐洲關於中國的知識的獲取”(A construção do conhecimento europeu sobre a China, c. 1500-c. 1630), 《向文明歐洲介紹中國的出版物和手稿》(*Impressos e manuscritos que revelaram o mundo chinês à Europa culta*)。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3月)(<http://www.tdx.cesca.es/TDX-1222103-160816/>)。
- 奧利維拉, 弗郎西斯科·羅格·德, “亞歷山大·德·羅德斯(Alexandre de Rhodes)”, 見《澳門歷史字典》(*Dicionário da História de Macau*)。澳門: 澳門大學葡亞研究中心。(印刷中)。
- 奧利維拉, 弗郎西斯科·羅格·德, “15-17世紀的澳門地圖繪製(Cartografia de Macau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見《澳門歷史字典》。澳門: 澳門大學葡亞研究中心。(印刷中)。
- 帕里(Parry, J. H.), 《1450-1620地理大發現時期》(*La Época de los Descubrimientos Geográficos: 1450-1620*), F·莫拉萊斯·帕德龍(F. Morales Padrón)翻譯。馬德里: Ediciones Guadarrama, 1964。
- 皮基奧, 盧西亞納·斯特卡諾(Picchio, Luciana Stegagno), 《開放的海洋》(*Mar Aberto*)、《葡萄牙人的航海》(*Viagens dos Portugueses*)。里斯本: Editorial Caminho, 1999。
- 雷內維勒, 雷內-奧古斯特·康斯坦丁·德(Reneville, René-Auguste Constantin de), 《為低地國家成立的東印度公司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服務的遊記文集》, 第二版雜誌, 增加了一些有趣的內容(*Recueil des Voyages qui ont servi à l'établissement & aux progrès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Formée dans les Provinces-Unies des Pays-Bas. Second Edition revue, & augmentée de plusieurs pièces curieuses*)。阿姆斯特丹: Frederic Bernard, 第二、三卷, 1725。
- 泰勒(Taylor, E. G. R.), 《1485-1583都鐸王朝時代的地理學》(*Tudor Geography, 1485-1583*)。倫敦: Methuen & Co., 1930。
- 泰勒《1583-1650都鐸王朝時代晚期和斯圖亞特時代早期的地理學》(*Late Tudor and Early Stuart Geography: 1583-1650*)。倫敦: Methuen & Co., 1934。
-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路易斯和克拉克的遠征——神話與歷史(Clark expedition – Myth and history)”。倫敦, 第371期, 第8375號, 2004年5月15日, 第45-46頁。
- 蒂勒, 皮埃爾·安東莞(Tiele, Pierre Antoine), 見《荷蘭航海日誌文獻》(*Mémoire Bibliographique sur les Journaux des Navigateurs Néerlandais*)。再版的德·布萊和赫爾修斯文集、17世紀荷蘭人航海日誌, 以及出版的古代外國航海家航海日誌。大部分由Frederik Muller在阿姆斯特丹出版。P·A·蒂勒重新編輯。附航海日誌及出版目錄。阿姆斯特丹: Frederik Muller, 1867。
- 烏特加亞, 路易士(Urteaga, Luis), “地理大發現開發及其歷史(Descubrimientos, exploraciones e historia de la Geografía)”, 《地學評論——人文地理評論集》。巴塞羅納: 巴塞羅納大學出版社, 71, 1987年9月。
- 沃維爾曼斯(Wauwermans), 《比利時與安特衛普的地圖繪製學校歷史》(*Histoire de l'École Cartographique Belge et Anversoise*)。阿姆斯特丹: Meridian Publishing, 第二卷, 1964。
- 威廉森, J·A(Williamson, J. A.), “理查德·哈克盧特”, 見愛德華·萊納姆(Edward Lynam, 編輯), 《理查德·哈克盧特及其成就——哈克盧特學會百年紀念特刊》(*Richard Hakluyt & His Successors – A volume issued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Hakluyt Society*)。倫敦: 哈克盧特學會(The Hakluyt Society), 1946, 第9-46頁。

蔚玲譯